

談分數膨脹(grade inflation)(註 1)：當"A 等第"變成平均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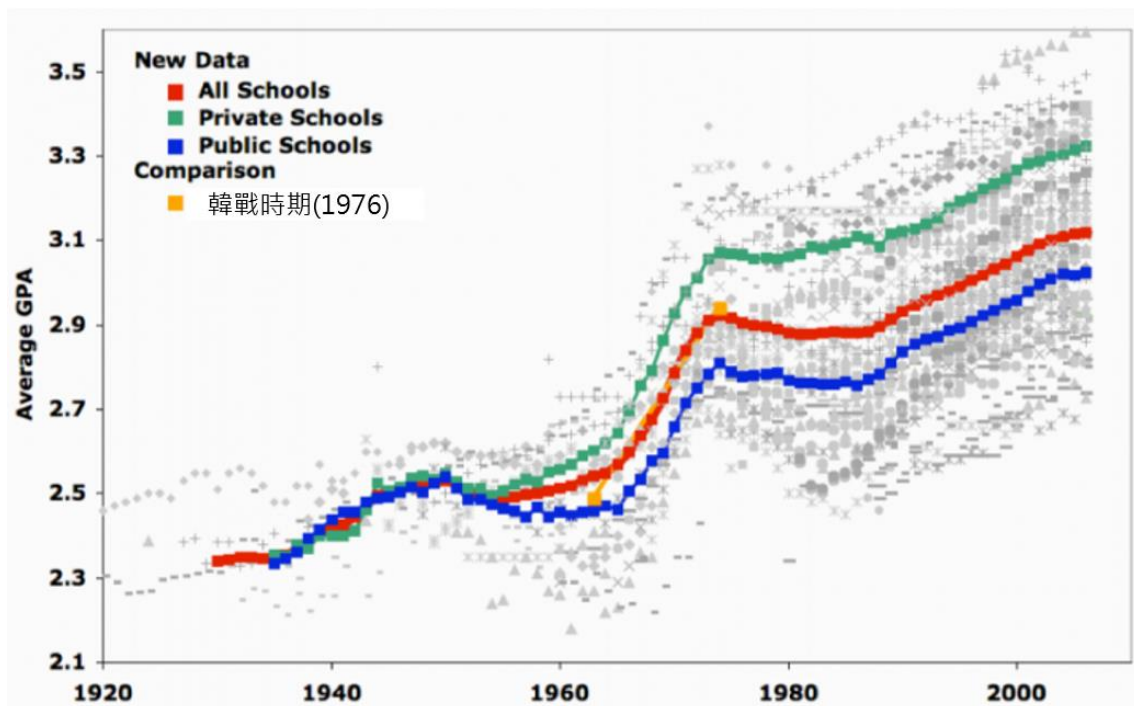
數據處校務研究中心 葉昱佐編譯

- 改寫自 Jed Applerouth. (2019, Nov 12). Grade Inflation: When A is for Average. *Applerouth*.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pplerouth.com/blog/2019/11/12/grade-inflation-when-a-is-for-average/>

隨著時間推移，學生成績的上升反映出文化變遷以及衡量成績看法的轉變。在美國，曾經 C 與 F 等第並不少見，而 A 等第相對罕見；如今則轉變為「以 A 和 B 等第為標準，C 等第頻率降低，F 等第則幾乎不會出現」的文化。

轉變從大學開始

這股將學生成績推向高分的力量首先出現在大學階段，接著進入高中階段。學者發現，大學平均成績在 1960 年代發生重大變化，並持續了數十年。尤其在越戰時期，GPA(註 2) 不高可能會影響兵役豁免的結果，而被徵招派遣戰場。於是，大學課堂分配成績的結果遠遠超過學生實際在學術成績上的表現，GPA 也開始攀升，如下圖。



(圖片來源：<https://www.applerouth.com/blog/2019/11/12/grade-inflation-when-a-is-for-average/>)

學者亦針對大學生成績變化情形進行研究，發現有名望的大學越有可能提高學生的成績，例如哈佛和耶魯等精英大學。在哈佛大學，1950 年僅有約 15% 的學生獲得 B + 等第以上的成績；而在 2007 年則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成績皆為 A 等第。在耶魯大學，2012 年春季大約 62% 的成績為 A 等第，而 1963 年相同等第卻只有 10.4% 比例。這樣的通貨膨脹的文化具有高度傳染力，到了 2012 年，類似學校的平均成績皆有明顯提昇，如下表。同儕學校不希望他們的學生在就業市場、碩博生市場與研究市場中處於相對劣勢，高 GPA 提高改變了學生在大學畢業後的軌跡。也因此，A 等第是現在美國大學最常見的等級，佔所有等第的 43%，而 1960 年代僅佔 28%。

學校	1960 年	1980 年	2000 年
哈佛大學	2.70	3.05	3.41
普林斯頓大學	2.83	3.13	3.36
耶魯大學	2.56	3.27	3.48
史丹佛大學	2.98	3.27	3.55
麻省理工學院	2.47	3.27	3.26
杜克大學	2.41	3.02	3.36
威斯康辛大學	2.51	2.89	3.13
華盛頓大學	2.31	2.97	3.12
平均 GPA	2.59	2.97	3.21

(表格節錄自：<https://www.applerouth.com/blog/2019/11/12/grade-inflation-when-a-is-for-average/>)

外部因素對成績造成壓力

上述現象說明在評分上的挑戰，在最純粹的狀態下，成績不受外界因素的影響：僅需衡量學生是否確實掌握課堂內容。但不可避免地，在其他因素介入後，這些外在力量的重擔使得成績的走向產生變化。

在喬治亞州，自 1994 年開始實施希望獎學金(Hope Scholarship)，該獎學金為透過免費或大幅減少大學學費，來獎勵學生以優良的高中成績就讀，因此新生的高中成績開始上

升，而其他學業表現上卻沒有相對應提升。高中階段的文化因此發生變化，許多老師亦對於「當學生拿到 C 等第，就代表他們的家庭將入不敷出」表示擔憂。

在基於績效的經濟援助時代，學生獲取較好的成績意味著學費減少以及錄取更好的學校，因此學生為了獲得更高的成績面臨巨大的壓力，父母亦瞭解孩子的成績會給家庭帶來經濟影響。因此，學生給老師施加壓力，父母給老師和校方管理者施加壓力，管理者又給老師施加壓力，最後學生成績就上升了。本質上，這是隨著父母和學生發揮力量而在教育中興起的「消費者文化」。

現在，許多老師對衡量成績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許多老師已經從常模參照(norm referencing)(比較學生的相對表現以建立成績分佈)轉向標準參照(criterion referencing)(每個學生都能獲得 A 等第的成績)。除此之外，許多老師也將例如參與度、努力情形以及態度等非成就因素整合到評分標準中。老師們也逐漸調整他們的評分行為，整合更多的加分獎勵、刪除最低的考試成績、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重新繳交作業以進行評分，甚至允許學生與老師「協商」他們的最終成績。因為這些變化，學生永遠不必面對高中成績不好的失望，也不需建立面對未來失敗或挑戰的韌性。

在高中階段的影響

高中階段的成績亦攀升了數十年。根據教育部及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的統計，1990 年高中平均成績(GPA)為 2.68；到了 2016 年，平均 GPA 已攀升至 3.38。學者亦發現，平均成績為 A(含 A-和 A+)的學生比例從 1998 年應屆畢業生的 38.9%，上升至 2016 年應屆畢業生的 47%。

這些成績的變化使我們能夠將更多擁有良好成績卻又缺乏基本技能的學生送到大學。許多學生上了大學，卻缺乏閱讀、寫作與數學的基礎技能，而需要補救教學課程。學生可能在進階先修課程(註 3)的微積分獲得 A 的成績，但上了大學仍需要針對基礎數學進行補救。如此技能不足的程度已經超出了大學教師所能挽救的範圍，在這種「一勞永逸」的環境中成長的學生常常錯過了體驗挫折、建立韌性以及其它情緒應對相關技能的機會，高估的成績也因此扭曲許多學生的能力與成就感。

大學如何回應

在一場校際會議上，各大學的招生委員(admissions officer)(註 4)討論從學校資料中看到的高中申請者成績分佈。在一所私立高中，97%的學生獲得 A 和 B 的等第、2.7%為 C、0.3%為 D；而在另一所私立高中，75%的學生加權平均成績超過 88.5 分(相當於 A 等第以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拿到 A 等第的成績已不再表示獨特及優秀。

招生委員對 GPA 成績的看法也與以往不同，既然高 GPA 成績已不足以驗證申請人的能力，他們期待有其他因素來驗證學生的成就和能力，例如進階先修課程測驗分數、SAT 學科測驗分數、SAT 和 ACT 入學考試分數、自傳以及簡答/申論題作答情形等，學生在高中的表現也可以協助與學生成就情形相連結。

結論

對於家人來說，重要的是了解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成績走向及發生的變化，現今學生的成績已受外界壓力、父母參與、競爭氣氛以及財務力量影響。隨著分數的大幅提高，招生的嚴謹程度比以往其他任何衡量學生成績的指標都更加重要，包括論文以及標準化測試等。

而對於大學招生辦公室來說，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分配稀少的名額並非容易的事。

儘管在通貨膨脹的文化中，成績的預測能力有所下降，但成績依舊是預測大學表現的最佳指標。一方面，我們知道招生辦公室採取的任何措施都會受到外界以及「市場力量」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優秀的大學並不會僅依靠單一因素來確認他們需要錄取的學生。我們越能縮小視野並放眼大局，就越有機會擺脫對學生成就衡量方式的過度執著與關注。

註 1：分數膨脹(grade inflation)：長時間裡，學生的平均成績提高(通常是 GPA)，但卻未伴隨相對的優異表現。(資料來源：https://ctld.ntu.edu.tw/fd/teaching_resource/page1-1_detail.php?bgid=1&gid=7&nid=453)

註 2：GPA(Grade Point Average)：大多數高等教育院校採用的一種評估學生成績的制度，計算方法為把學科所得到的等級，換算成為一個點數，再按照各學科所佔學分比例加權所得的數字，最常見的成績平均點數為四分之制：A 為 4 分；B 為 3 分；C 為 2 分；D 為 1 分；F 為 0 分，如果有+號加 0.3 分，有-號則減 0.3 分。(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7%B8%BE%E5%B9%B3%E5%9D%87%E7%A9%8D%E9%BB%9E>)

註 3：進階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AP)：又稱大學先修課程，為相當於大學一年級課程的程度，通過 AP 考試者，可憑其成績向大學申請學分折抵，同時也是申請美國大學衡量的重要指標之一。(資料來源：

<https://www.envisionprep.com/ap-advanced-placement-35506312432145032771354303177720171.html>)

註 4：招生委員(admissions officer)：美國大學的招生辦公室(admissions office)職員致力於提供學校或申請資訊給未來申請者，學校會聘僱校友、學校主任、學院院長擔任招生委員，最終目的是為學校選出適合的學生。(資料來源：<https://rocketadmit.com/who-is-adcom-admissions-committee-officer/>)